

在“兩個正確”軌道上濶步前行 ——淺議新形勢下澳門“一國兩制”實踐

楊允中*

一、基本法實踐的“兩個正確”觀

“兩個正確”觀係指對基本法的正確理解與正確實施。根據當前特別行政區現實，對“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正確理解已是一種常態化要求，因為它是確保這項基本國策正確實施的前提。在高度自由化、多元化的香港、澳門，要求做到一元化正確理解實不容易，但在一些原則問題上力求保持認知大方向的一致或接近一致，又是不容放鬆的追求目標。其實，完善基本法實施機制就包括認知的全面準確和執行力的有效到位。通常提及的機制“泛指一個工作系統的組織或部分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方式”¹，即對某系統生存與發展的保障、協調、執行、約束行為。無論自然現象還是社會現象，在其存在與發展過程中都依一定規律或條件互相適應，力求保持穩態與強勢。在人類文明進入全面信息化時代的今天，強調對基本發展規律的認知應成為社會文明進步一項基本要求。

中共十八大五中全會推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具有不同凡響的理論創新價值和普遍意義。因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協調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綠色是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體現”，“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² 這些體現發展規律的新理念不僅對進入發展常態的經濟領域，而且對社會領域的提速改革亦具相當重要的指導作用。不管屬於任何一種社會制度，不管處於任何發展階段，強調生存與發展規律都是不可須臾離開、不

容有認知偏離與行動失控的掌控主題。

在進入全面驗證“一國兩制”科學性與生命力的特別行政區發展階段，人們不應滿足於認知的表面化、簡單化、初端化。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當“一國兩制”基本定型並成為一項基本國策時，“馬照跑、舞照跳”曾成為理解“一國兩制”一個十分時髦而普遍流行的界定用詞和期望用詞。隨後投入巨大人力物力進行起草的兩部基本法，對於甚麼是“一國兩制”、如何全面實施“一國兩制”及時作出了明確的規範和指引。基本法作為特別行政區根本大法，其序言開誠佈公、開門見山地指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法方針政策的實施。”（《澳門基本法》序言）

這表明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是基本法的母法，憲法的尊嚴和權威在特別行政區必須得到不折不扣的維護；基本法作為國家的一部憲制性基本法律既是特別行政區的根本大法，又是當代全中國人民意志和願望的集中體現，對基本法不走樣的正確理解事關“一國兩制”的正確實踐，也是包括特區居民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根本利益所在。

二、幾個重要關係的合理界定

（一）變與不變

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 50 年不變，

* 澳門理工學院理事會顧問、教授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的承諾和《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5條的莊嚴規定，亦即憲制性規範所作出的指引。這是特別行政區最大最根本的“不變”，但理解“一國兩制”與觀察當前特別行政區現實又不宜停留在簡單化、片面化的認知層面。首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業已恢復行使主權的香港、澳門兩特別行政區，原港英、澳葡長期以來實行的殖民管治形態已成歷史，代之以具“一國兩制”特徵的嶄新特別行政區制度，亦可稱之為新型發展模式或新型社會生態。當下，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是直屬實行單一制社會主義制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特別行政區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別行政區。因此，可以講特區政權性質已完成了脫胎換骨的轉變。其次，特區的管治架構其核心已發生了質變，特區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已按基本法實行了全面本地化並依法進行效忠宣誓，而且產生方式也最大限度地體現了現代民主政治，比之回歸前總督由宗主國越洋委任是歷史性的超越；特區三大管治機構之一的立法機關全部或多數議員由選舉產生，這也是一項歷史性進步。再次，基本法所設計的民主參與進程體現循序漸進、均衡發展原則，特區居民的主人翁地位及權利保障的充分性已有實質性加強。他們不僅直接參與特區的改革與發展，而且還通過特別設計的模式間接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如依法選舉產生特區的全國人大代表參加全國人大的工作。再再次，特區在中央政府授權下可以在某些適當領域以“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名義參加國際組織與國際會議，而且在制定基本法同時還為特區單獨制定了區旗區徽。最後，在特別行政區廣大居民的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意識已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這不僅因為他們身上存有與生俱來的民族血緣基因，而且也由於國家日益強大，他們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越來越強烈，他們與國家主體部分居民構成無法擺脫的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

綜上，可以直觀地認定，保留原有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是最大的不變，而在政治體制及社會價值觀的調整上出現的改變又是歷史上最為深刻的，這是社會文明的巨大進步。孕育這類變化的特區社情既有別於回歸之前，也不同于實行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的國家主體部分；這類變化不僅是具特定積極性、建設性的正向變化，而且也屬於認知領域與制度體系的突破性探索與創新。

(二) 被保留的原有資本主義制度與特別行政區制度

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是保護私有制及此前提下的生活方式，基本法強調的是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即本地資本主義，而非泛泛的西方資本主義。本地資本主義某種意義上是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傳統發展的現代資本主義，它除了要遵循市場經濟價值規律力求經營效益最大化外，還有一個帶普遍性的特點就是不忘自己是中國人和堅守中國文化傳統。在這個優秀傳統中有幾個核心價值認定：一是愛國、為中國人爭氣；二是堅持勤儉、艱苦創業；三是回報社會、反饋大眾。正因為如此，以華人資本為主體的原有資本主義就是一種有競爭力、有潛質、既有國際聯繫網絡又熟悉祖國內地發展環境的資本主義，當然，在特區也同時存在非華人資本主義，但它們必須在基本法和特區法律規範下運行，不得同特區整體利益相違背。所以，把原有資本主義等同於西方資本主義、把特別行政區有意無意納入西方經濟體系和價值觀體系，是不妥、不符合特區現實的。

特別行政區所以特就在於它不僅不實行國家主體部分的社會主義制度，也在於它不是實行百分之百的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百分之百的原有發展環境；原有的資本主義的優勢一面當然要保持並充分利用，而背靠祖國、依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富饒資源和廣大市場同樣是一種天然傳統優勢，更要充分利用。故此，從制度層面觀察，特別行政區儘管保留原有資本主義，但不等於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領域全面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準確地講，從回歸那一天起因基本法全面生效有“一國兩制”特徵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已正式進入其實施階段，並逐漸展示出其生命力、科學性與創新價值。這也表明，原有資本主義與特別行政區制度不是兩個對立的概念，但資本主義制度與特別行政區制度卻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不錯，現行特別行政區制度包含了原有資本主義並為其繼續發展壯大提供了充足合理空間，但這不等於原有

資本主義主宰一切，更不可以把特別行政區說成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一部分。這本身也是“一國兩制”理論需要及時加以澄清的一個原則性問題。

(三) 國際化與大陸化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信息化時代，國際化無疑是個重要衡量指標。國際化內涵應包括參與國際性活動的廣度與深度、自身成長與發展的對外依存度、形象與傳統的輻射張力等方面，這就要在人財物三個維度進行觀察。香港、澳門都是傳統國際自由港，區位優越、交通便捷、法治良好、官員訓練有素都是有利條件。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與特別行政區制度，其優勢進一步疊加，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但這不表明國際化就是西方化或美國化，不管過去參與國際性活動的深度如何，在第 21 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的當下，國際化的新內涵應引起人們足夠重視，由於歷經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奮進中國和平崛起已成為全球公認的事實，中國現擁有逾 10 萬億美元的經濟存量且每年仍以高出世界平均值二倍以上的速度提升，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仍高達 26% 以上，作為全球經濟的重要發動機和牽引車之一，中國和平崛起就是當今最大的國際化，中國就是當代世界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故當今國際化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同中國接觸面的邊界效益。

港澳兩特別行政區是中國的地方行政區域，而且直接背靠國家第一強省廣東，所以特區加大對內地發展的參與度、合作度天經地義，無可厚非，不能也不容動不動就指責是脫離國際化或依賴大陸化。改革開放之前之初，中國經濟相對落後，同國際社會脫節，這是事實。但和平崛起後的今天，中國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不僅要繼續改寫自己的民族發展史，盡快全面實現“兩個一百年”的中國夢，而且也要通過對外合作全面影響、拉動周邊地區以至全球進入具新內涵的全球一體化進程。簡言之，當代中國已越來越深地同全球發展融為一體，中國因素已越來越成為當代國際化的核心內涵，背靠祖國這一天然優勢一定要開發好利用好。

(四) 現代化與傳統化

現代化即科技與信息主導的現代基本發展模式，它不僅導致資源配置的合理化、生產效益的集成化，而且也推動生產與社會管理以及發展理念的轉換和升級。推動現代化既是面對競爭的需要也是完善發展思維的需要。中共“十三五”規劃建議把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並列為新形勢下五大發展理念，其中創新更被列為五大發展理念之首。正如習近平所講：“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必須依靠創新驅動”，“企業持續發展之基、市場制勝之道在於創新”。³

現代化的關鍵在於走出一條獨立創新之路，而實踐“一國兩制”正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創新，這是人類文明史上不曾有過的最具震撼力的制度創新。試問把人類社會近二、三百年來誓不兩立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基本社會制度對立統一在特別行政區社會實踐，其創新價值與意義絕對無與倫比，同時也把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方法論翻開了嶄新一頁。當然，作為新生事物在其成長過程中難免遇到一些阻力和挑戰，新制度本身也有待進一步充實與完善，這是順理成章、符合規律的事態發展。與此同時，人們也應及時調整關注點與面、深度與亮點，尤其要從特別行政區現實中總結基本規律與經驗，令其前進征途上盡可能避免不必要的資源浪費，盡可能在發展目標與大方向上不走彎路或少走彎路，亦即力求做到有備而戰、戰而能勝，把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關注現代化、關注創新開拓的同時，還應時時刻刻不忘我們強大的民族文化傳統，像天下大同、和為貴、上善若水、求同存異、福禍相依、大智若愚等符合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原則，早在二千多年之前就已成形並不斷完善。先祖不僅教喻我們要立志報國、矢志不渝，所謂實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且也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要修煉成“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⁴，意指德化高尚的人不應志在追求一官半職，志存高遠的人不應滿足於一時一事成就，誠信正直的人不需靠誓約來約束，與時俱進的人

不宜隨波逐流、輕易跟風。我們中華民族豐富的文化傳統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聚寶盆，當代人和未來的世世代代要懂得珍惜，不能因虛無主義無知而數典忘祖、不知所以。

(五) 共同願景與殊途同歸

“一國兩制”是作為基本國策推出來的，而基本國策的基本特徵是科學性、法制性、可行性以及穩定性、長期性、不動搖性。“一國兩制”產生於改革開放新政推出的歷史時代，它也伴隨不可阻擋的改革開放大潮迅速成型並進入以基本法制定為代表的制度化導向發展階段。在香港、澳門於 20 世紀末正式回歸之前“一國兩制”仍處偉大構想階段，儘管它具有極高的多重創新價值，無論特別行政區當事方還是國際社會依然期待與觀望同在、信任與持疑並存，茲因為還未正式進入實踐。自從 1997 年 7 月 1 日和 1999 年 12 月 20 日這兩個具里程碑意義的日子起，迄今香港、澳門兩個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分別有四個五年期的實踐歷程。應該說，隨着兩個特區的開拓探索，“一國兩制”作為史無前例的憲政創新、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其無與倫比的驗證與示範價值與效應已有目共睹並得到日益廣泛的肯定與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總綱中對財產權明文規定“兩個不可侵犯”，一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第 12 條)，為此，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佔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二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第 13 條)，為此，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在這兩項列為憲法總綱的重要憲法規範指引與保護下，國家經濟領域發生的巨變特別是居民實際收入和可支配財產的快速增長已把中國推向全球最大中產階層社會的邊緣，大部分中國人業已過上體面的、受人尊重的好日子，“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已逐步變成大多數人共同富裕的社會現實。在《2016 胡潤全球富豪榜》中，全球坐擁十億美元以上的 2,188 名富豪中，中國有兩大超越：一是大中華地區共 568 位富豪，首超美國 535 位，二是北京擁有 100 位富豪，首超紐約，成為全球超級財富創造者最密集的城市，號稱“十億美金富豪

之都”。⁵ 中國的王健林、馬雲、宗慶後、馬化騰等超大富豪身家都在 150 億美元以上。《新財富》公佈的 2016 新財富 500 富人榜涉財富總額人民幣 8 萬億元，佔 2015 年全國 GDP 的 12%，王健林仍踞榜首，上榜門檻人民幣 65 億起計的中國富豪已達 302 人。⁶ 應該說，世界級富豪如此密集而快速出現，本身就是“中國特色”的具體化，因為他們都是順應改革開放新形勢依法佔有財富並擴大財富，他們為國家逐步實現富強發達並走向世界做出了一份不可或缺的積極貢獻，甚至國企辦不到的他們也能辦到，外國人辦不到的他們同樣能辦到。從理論上界定，說當代中國的富家現象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道獨特風景綫，或者被認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環境中具正能量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也許應該成立。

兩個特別行政區現有實踐已令人信服地表明，“一國兩制”作為一項文明史上不存先例的創新事業，雖然表面上觀察有些特殊，同國家主體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存在不協調甚至矛盾，但實質上它非但未能同國家主體部分脫鉤或背離，反而是其在新歷史條件下的有益補充。在實行單一制社會主義的國家內局部歷史背景與社會現實特殊的地區保留其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不僅可行而且具有優越性；不僅無損於國家主體地區原有社會主義制度，而且對其構成特殊形式的優勢互補、共同獲益；不僅對國家堅守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傳統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絲毫沒有背離與傷害，反而成為其全新歷史條件下實現國家和平統一與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一種殊途同歸、異曲同工。實行“一國兩制”，是一場真正改天換地的社會大變革與歷史大超越，更是人類文明史上認識論方法論領域的一次標誌性升華。

三、政治領域挑戰及其應對

面對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實踐出現了某些人們不想見到的脫軌行為和扭曲現象，2015 年 12 月，習近平在接見赴京述職的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時代表國家適時提出了“四不”主張，他說：“我想強調的是，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

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的方向前進。”⁷ 其中，前“兩個不”強調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定不移和不會變、不動搖，明顯是從中央立場出發、向港人社會以至全世界說的。後“兩個不”則是對特別行政區的要求與希望。而要確保“不走樣、不變形”就要首先弄清“一國”與“兩制”、大我與小我、中央與特區關係的合理界定；不顧國家、民族利益，少數極端民主派人士一味對抗特區政府並進一步挑戰中央政府管治權威甚至公開鼓吹“港獨”的行徑已經構成違法違憲，不應任其自由瘋長、繼續危害社會，而特區政府某些核心環節認知與行動雙不到位、姑息養奸以及部分居民判斷思辨能力偏低，隨風飄擺甚至袖手旁觀、幸災樂禍的心態，都是與時代大潮脫節的非常態現象，要想“一國兩制”、基本法正確實施，建立正當正常的是非觀，依然是特區高端與廣大居民需認真關注、認真補課的一環。

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有各自的成功經驗和各自需要面對的問題，繼續總結好各自“一國兩制”實踐的基本規律，走好未來實踐新征程不容有誤有失。為了確保新形勢下“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做到以下“五個堅持”恐怕是十分必要的。

一是堅持維護好國家利益與特區利益兩本賬，且有必要把國家核心利益擺在特區利益之上。其道理很簡單：①國家利益包括特區利益，不肯愛國的人難求其真正愛港愛澳；②認定中央與特區關係是互利共贏關係，確保其健康發展，特區尊重中央、中央關愛特區是“一國兩制”的題中之意；③不能違背中國國情與世界潮流，中國是成功實現和平崛起的發展中大國，提升自身發展的中國因素、搭中國快車業已成當今最時髦的世界潮流，作為中國自己的特別行政區當然不容怠慢，特區享有憲法和基本法共同設計與規範的高度自治權，享有實行“一國兩制”的合憲性、合法性、合理性，對於特區政府與居民來說，任何時候也不能忘本，不能淡忘作為當代中國人的神聖使命，要時時刻刻心裏裝着祖國和人民。

二是堅持依法施政、依法治港、依法治澳大方向。制度貴在實施，有效實施的前提是對其正確理

解，正確理解要求人們思維理性化，並進行必要而深入探索研究。“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⁸。這是中央十八大提出的要求。“依法治國的精髓是依法治權、依法治官、依法治吏，這是質的改變。”⁹ 確保高效依法施政還要強調參與意識，要積極參與就有必要適度關注政治發展。政治事關大局、事關方向，政治是公權力的正常行使，是民主、人權的保障，政治體現大學問、大智慧；人們可以不參政不從政，但對政治與政治理論關注一下絕對有益無害。

三是堅持對特別行政區制度正確理解，亦即對基本法的正確理解。《澳門基本法》序言開宗明義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基本法係根據憲法由全國人大制定，基本法的任務與職能就是對特別行政區制度作出規定，以確保基本國策的落實。《澳門基本法》進一步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第 11 條）這表明特別行政區制度由三大版塊組成，三大版塊互為依存，共同構築了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架構，實際上《澳門基本法》九章 145 條就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具體化。

四是堅持官民雙強雙輪驅動。當今特別行政區不僅政府要保持強勢，包括執政能力與執政理念雙強，社會也要保持強勢，包括愛國愛區意識與開拓創新意識達到雙強。政府依法施政的堅定性與社會各界遵法守法的自覺性，要持之以恆、警鐘長鳴。要做命運、利益主人，做“一國兩制”事業開拓者、特區第一代建設者，做新事新辦、特事特辦行為主體；愛國愛澳、愛社愛家，特區居民要和時代一起進步，極少數人對國家現行制度即使有所保留也應做到遵紀守法。“一國兩制”事業要發展，後繼有人十分重要，故關注青少年培育與公民意識提升是當前強化認知、加大推進力度的一大首要課題。歷史把天時地利人和這歷史性

機遇帶給澳門，肩負驗證嶄新社會制度與政治制度使命的當代澳門人沒有理由猶豫、遲疑，澳門地方不大，卻可以成就一翻大業。

五是堅持自我完善、循序漸進。“一國兩制”實踐與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全面實施，它不可能一出現就十全十美、完善有加，它必然要在未來實踐中繼續接受新問題、新矛盾挑戰，故堅持自我完善、堅持在實踐中提升實踐水平、堅持對發展規律的認真探索，就十分之重要迫切，力求使“一國兩制”示範價值逐步受到認同，使這項中國幾代人創造的新興政治制度進一步成熟、嚴謹、適用、可行，是特區政府和各界居民的共同使命，不容遲疑延誤、不容錯失發展良機。

四、經濟、民生是社會穩定和諧的基礎

(一) 怎麼看進入調整期的澳門經濟發展

自2014年6月以來由於澳門主體經濟博彩業毛收入持續下滑，人們對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前景似乎產生一定疑慮甚至動搖。毫無疑問，2015年是澳門回歸以來首次出現指標大幅下調的負增長年。也可以講，澳門已進入一個結構性調整的經濟過渡期，這是內外諸多因素疊加的必然結果，既有結構性因素又有周期性因素，既有內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在一定意義上講，這也是對前些年經濟超高增長的及時反彈。

澳門是個超小微經濟體，其發展規律的獨特性、獨創性向來受到內外遠近高度關注。一方面，澳門是個優勢十分集中的、不容被取代的經濟體，無論從自身發展還是從粵港澳一體化進程以至在國家長遠發展戰略中的地位與功能，澳門均具有罕見的潛質、罕見的優勢、罕見的前景，不容低估、不容忽略；另一方面，澳門又是一個典型的對外依賴型地區，依賴特殊的產業結構、依賴特種服務業、依賴境外客源拉動、依賴周邊和國際經濟旺景拉動，故難以在中國經濟增速下調與國際經濟不景中偏安自保，這就要求在調整期看準站穩，既不被錯誤信號誤導也不發出誤導的錯誤信號。

澳門2014年經濟總量達到澳門幣4,434.68億元，人均GDP為澳門幣713,143元，即89,287美元，

同年人均GNI為澳門幣611,719元，即76,589美元。這不僅是澳門歷史上最高水平，而且在亞太以至國際上都可列為領先指標之一。2014年2月博彩毛收入為澳門幣380億元，這是一項歷史上的峰值。然而自2014年6月起連續下滑，其中2015年11月僅為澳門幣165億元，但大多數月份仍保持在澳門幣180億或以上。這表明現階段博彩業月毛收入保持在澳門幣180億元或以上即澳門幣6億元/日或以上的平均值是可能的。根據政府公佈數字，澳門2015年是一個緊縮年，全年財政結餘仍有澳門幣292億元。特區政府2016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重點是“促經濟、重民生、穩發展”，政府預算總收入為澳門幣1,032.5億元，總支出為澳門幣850.38億元，全年仍可結餘澳門幣147.44億元。這也表明，即使2016年經濟運行依然弱勢，不僅民生福祉不致受到影響，而且仍是一個自給有餘的微型經濟體。根據各方面包括專業人士研究預測，澳門經濟2016年上半年很可能仍受下調趨勢的負面影響，而下半年則可能穩住陣勢進入低幅恢復期。

對形勢分析認定不宜簡單化、片面化、絕對化。建立正確的形勢觀，站穩腳跟、積足底氣，不為表面現象所惑、不受亂相干擾，善於借力借勢發展，這是居安思危、開源節流，積極面對調整期波動的需要，更是堅定信心、確保進入新時期新階段“一國兩制”正確實踐的需要。

(二) 有待加大關注力度、及時做出正確認定的幾個問題

1. 博彩業調整已逐步見底

經過長逾20個月的漫長調整期，澳門博彩業調整開始觸底反彈，毛收入基本可保持在180-200億/月的趨穩態勢。這裏，進一步強調若干基本認識仍有必要：①博彩是現代服務業中的特種門類或特種服務業，是社會收入二次分配的低理性化選擇形式，它在特殊社會環境下的存在價值不容輕易否定；②博彩業是澳門合法產業，也是惟一主導產業，開放十多年來總體走勢正常、貢獻不菲；③當前的調整有其內部與外部影響因素疊加的複雜性、多元性、難以迴避性；④2014年6月至今近兩年來調整已基本見底，政府做

法的澳門幣 200 億元/月毛收入底綫有望在 2016 年內達致，在其他產業暫難突破情況下博彩業繼續扮演主導產業角色不容懷疑，即使保持澳門幣 180 億元/月的水位，澳門平衡預算仍可實現。當然，對博彩業監管的法制化、科學化亦應成為政府施政的一個長效重點，相信 2016 年即將推出的博彩業中期檢討有望打開依法與科學監管新的一頁。

2. 國家“十三五”規劃，澳門不能缺席

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中國經濟長期向好基本面沒有改變。中共中央關於“十三五”規劃的建議有關時代主題和發展態勢所作這兩個“沒有變”的判斷，十分準確與客觀。當下澳門特區的發展已同國家發展已同國家發展構成正相關，國家好澳門一定好，因而上述判斷也是認定澳門發展大環境的基本依據。

“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向形式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階段演化，這也是我們做好經濟工作的出發點。在新常態下，要實現新發展、新突破，制勝法寶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¹⁰ 習近平的“四個全面”理論，特別是其中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更是經濟與政治領域的兩大突破口，或兩大抓手。顯然，這些判斷對於發展進入調整期的澳門，也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深化內地和港澳合作發展被列入“十三五”規劃第六部分“堅持開放發展，着力實現合作共贏”中。為此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¹¹

“十三五”規劃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做好“一個中心，一個平台”既是澳門未來發展方向，也是國家對澳門的發展要求。要不失時機地配合並跟上國家發展大向，澳門恐怕要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作好發展定位，進一步提出切合實際的發展規劃。2016 年 4 月修正提出的《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 年)》(草案文本)已有比較完善的框架，在澳門特區發展史上將留下重要一頁。

3. 參與“一帶一路”不能停留在口頭上

“一帶一路”是國家未來發展的一項長遠戰略，也是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後把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理念在境內外適度拓展的必然選擇。絲路起程國與相關聯繫國互通、實現共商共建共享、構成當今時代跨國間平等合作、互利共贏的最佳發展模式，其中互聯互通不僅是基礎設施方面，在發展理念方面亦要通過雙邊與多邊之間消除誤解誤判、提高對現代發展觀的認知與理解。這正是成功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傳統優勢與競爭力所在。

澳門歷史上早期曾是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不僅地理位置重要，聯繫對象特殊，開放包容已成傳統，而且擁有國際自由港的制度優勢和聯繫葡語國家的文化優勢，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引下扮演一個積極可靠的海上樞紐是可以寄以厚望的。推進“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澳門不能缺席，而且大有可為，但盡早作好相關論證加以引導，迫在眉睫、時不我待。

4. 澳門管轄水域的合理利用

2015 年 12 月 20 日國務院在澳門回歸 16 週年紀念日正式頒佈明確澳門水域管理範圍和陸地界綫的第 655 號國務院令。澳門從此擁有自行管理的 85 平方公里海域。

這是中央政府為支持澳門特區可持續發展的採取了一項有力措施。正確規劃海域、合理利用海域成為澳門特區一項嶄新課題。明確水域管理範圍為擴大合理利用發展空間提供了十分有利條件。理論上不僅有利於澳門在轄區內實行有效管理，而且也可規劃適度填海造地以至拓展一些可能的海洋經濟類產業。但實事求是地講，如果簡單化地把 85 平方公里視為增加陸地面積 2.8 倍，可開發多種海洋產業中心，填出不同功能的海上新區甚至發展成“東方迪拜”，這類善良願望可以理解，但實際可行性、可操作性卻難以被認同。因為澳門北、西兩側無法拓展，東側隨港珠澳大橋通車也將不存大幅開發可能，惟一南側又距國際深水航道很近，開發難度不容低估。到底這 85 平方公里水域的最大開發利用率幾何，恐有待進一步做出嚴謹周密的論證、研究後方可明朗化。總之，依法管海、科學用海的大方向大原則要長期堅守，不容被簡單化、理想化判斷所誤導。

五、有關幾個具體問題的思考

(一) 關於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推介

回歸以來澳門特區政府在推動基本法宣傳上作了大量切實工作，對鞏固居民愛國愛澳傳統、落實“一國兩制”具有實實在在的指引作用。有關憲法地位、效能的宣傳近來已得到加強，但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宣傳、推介仍顯不足，以致有些官員和社團高層人士至今不瞭解甚麼是特別行政區制度。可見對“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持續宣傳與系統培訓，不能一蹴而就而要常態化、系統化。

特別行政區站在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最前沿。實行“一國兩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非但不是傷害，反而是新時代新形勢下的求同存異、優勢互補；非但沒有同傳統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脫軌，反而是對經典理論獨具創新價值的成功探索與大膽突破。因而，可以充滿信心地認定，全面體現“一國兩制”實質與精神的特別行政區制度同國家原有基本制度是殊途同歸、異曲同工，目的都在於確保國家和平統一與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

(二) 關於青少年成長與全民愛國教育

青少年是社會未來，確保他們健康成長成才是政府與社會的共同責任。但強調青少年教育不等於成年人個個合格與優秀。澳門當前不低的犯罪率，2014年各類刑事犯罪已達1.4萬件¹²，其肇因絕大多數都是成年人行為失範失控。香港一再出現亂局，參與其事大都為當代青年，但同某些極端民主派的言行舉止有直接關聯。故此，抓緊青少年教育事關“一國兩制”事業的成敗，但成年人公民意識的持續提升也一時一刻不容放鬆。

(三) 關於前瞻性思維與危機意識

澳門特區16年來全民貫徹實施基本法、維護“一國兩制”新型法治取得不俗發展，成為驗證“一國兩

制”的展示樣板，因而受到中央領導和全國人民的基本肯定。作為第一代澳門特區官員與居民，大家都應引以為榮並對未來充滿自信。考慮到澳門內外環境複雜多變，同港、台存在天然聯繫渠道，故政府與官員似不應放低警覺，力求普遍建立居安思危、開源節流等理念十分重要，而必要的前瞻思維與危機意識以及嚴謹可控的防範機制，恐同等重要。

(四) 關於澳門人口規模

澳門是傳統的微型經濟體，當前面積為30平方公里、人口為65萬，人口密度為22,166人/平方公里，明確自行管轄海域為未來發展增加了潛在資源，但不等於可開發面積無限擴大。鑒於人力資源的重要性，適度擴大人口規模如未來20年內面積擴大量為20-30%，而人口增長量上限宜控制在85-90萬以下，應是有利的，但如果不顧現實環境一味地企求靠人口數量擴大模式來拉動經濟，顯然是不明智的、難以為繼的。

(五) 關於五大發展理念

“十三五”規劃十分強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大新型發展理念，堅持這幾方面要求對於澳門迅速走出經濟調整期恐同等重要。“十三五”期間，國家要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交往中的地位和功能，對於澳門，重要一步棋是做好“一個中心，一個平台”的加速建設。五大理念中創新是龍頭，而實踐“一國兩制”就是國家級的憲政創新，澳門本身則是驗證“一國兩制”科學性、生命力的實踐前沿。由何厚鏞、崔世安兩位行政長官決策成立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八年來對於“一國兩制”實踐規律作了一些初步探索，但未來路還長，實際上關注對“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思考與總結亦應成為澳門特區官員與社會各界持之以恆堅持的一項共同性發展要求。

註釋：

- ¹ 見《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628頁。
- ² 《中共中央關於十三五規劃的建議》，載於《求是》，2015年第22期，第6頁。
- ³ 《習近平國內考察，凸顯治國理政新思路》，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年1月14日，第05版。
- ⁴ 見《禮記·凡學之道》。
- ⁵ 《王健林1700億躋華人首富》、《京首超紐約成富豪集中地》，載於《大公報》，2016年2月25日，第A17版。
- ⁶ 《王健林重登中國首富》，載於《大公報》，2016年5月5日，第A02版。
- ⁷ 《習近平會見梁振英強調，“一國兩制”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載於《大公報》，2015年12月24日，第A01版。
- ⁸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42頁。
- ⁹ 喬曉陽：《學習宣傳憲法，加強憲法實施》，載於《中國人大》，2015年第24期，第19頁。
- ¹⁰ 《擊楫勇進在中流——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深改關鍵之年工作評述》，載於《新華澳報》，2016年1月8日，第3版。
- ¹¹ 同註2，第14頁。
- ¹²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澳門資料2014》，澳門：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5年，第7頁。